

飲冰室 文萃

梁启超演讲集

梁启超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演讲集

梁启超 著
贾菁菁 编选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演讲集/梁启超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7

ISBN 7-80696-219-0

I.梁... II.梁... III.梁启超(1873~1929)—
演讲—文集 IV.B25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156 号

梁启超演讲集

梁启超/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cbcs@yahoo.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000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219-0

定价: 2.00 元

序 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大力编辑出版《梁启超全集》的同时,又及时推出《饮冰室文萃丛书》,选择梁启超那些富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思维,且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检验,仍熠熠生辉的学术专著重新标点、校对、排印,让优秀的文化精品再展风姿,为推进学术研究,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品味发挥作用,实在是值得提倡和庆祝的一件大好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涉及面广,对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现存的《饮冰室合集》近一千万字,如果加上书信和散失的其他文论,一千四百万字是应该有的。概观梁启超的论著,除诗歌小说之外,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章文体写的针对时局的各种政论性文章;二是以学术语言写的研究中外历史和文化的学术专著。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编辑《饮冰室合集》时,将梁的第一类文章编为文集;第二类文章辑为专集。这种分类是颇有见地的。但无论文集、专集,从梁文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感悟出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情理性和现实感。

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勇于和善于用情写作,人们称其“笔尖常带感情”,是很真切而形象的。这种情,包括对祖国的热爱,对专制集权的痛恨,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对学术文化的珍爱,对妻子儿女、亲朋好友的亲情等,一个“情”字,是阅读梁启超文论的基础。不过,梁启超的情,是完全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往往是情中有理,理中传情,其文章之所以感人,情理交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梁启超所讲的理,大都顺应时代潮流,合乎民众需求,代表了近代中国走向

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其读者群的与日俱增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他写的《少年中国说》,真是激情澎湃,豪情满怀,读了没有不让人为之震撼的;他著的《袁崇焕传》,真可谓知人论世,心系英雄,读了没有不拍案叫绝的;即使是《戊戌政变记》这样的历史专著,也是在倾注了对维新变法一片深情的基础上,痛定思痛,悲愤交加,以其切身的历史体验,按史书的格调写就的。如果再看看他那些演讲、笔记、大学讲稿、给妻子儿女的家书,则更突显出梁启超火热的情,炽热的爱,以及率直而令人信服的哲理。

梁启超的所有论著都是有感而发,无病呻吟的作品基本与其无缘。现实感是把握梁启超文论的关键。早年他投身变法维新,其论著基本随着改革的脉搏跳跃。1898年流亡海外后,他不仅关注国内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动向,而且依托世界,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渐渐就把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人生、学术与文化等结合起来思索,故其文论广泛而几乎无所不包,激进而几乎涉及时局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个先进中国人走向世界后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不断进取的追求。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名,主要是在这期间奠定的。1912年后,受其沉浮于民初扑朔迷离的政治所制约,其论著和当时的历史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后,梁启超退出政坛,在天津的饮冰室读书写作,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上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专著多在这期间写就。《饮冰室文萃丛书》所选的书目也多是这些著作,首批推出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1918年后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专著,也体现了梁启超结合现实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追求,深层次地反映出其心灵与现实的互动。为了让读者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梁启超晚年论著的精神实质,有必要探讨一下其1918年后的文化心态。

梁启超生命的最后10年,即1919到1929年,就文化观来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前30年间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一贯思路不同,他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55页)。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年

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尤其是结合 1919 年到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后,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

梁启超参政热情很高,但从来都不得志。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没有丝毫减弱他的政治斗志,但被清兵追捕的逃亡滋味着实让他心惊肉跳。民国建立后,他组党结社,在议会政治的旋涡里周旋,但总是被人利用,难遂心愿,先是上当于袁世凯,后又被段祺瑞算计,作过财政总长、司法总长等大官,却疲于应付,一无所成。1918 年他被迫退出官场时不仅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西方文化发生了动摇。于是决心到欧洲亲自考察一番,看个究竟。从 1918 年 12 月 28 日到 1920 年 1 月 23 日,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勱、蒋百里等 7 人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区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还发表演说,交流学术,结交了许多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对政治迷茫后心灵苦闷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综合梁的切实感受,一是欧洲不愧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技发达,政治有序,具有法治传统,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国民素质和社会整体水平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二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衰退,物价昂贵,煤炭“都比金子还贵”,冬天供应不了暖气,而且两极分化严重,工人罢工,民众示威,社会革命暗潮涌动;三是“科学万能”走到了极端,将社会给“物质”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23,第 11 页);四是欧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西方社会文化发生了动摇,迫切地想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的办法。他们不失时机地邀请梁启超介绍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一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还劝梁回国后少研究西学,多引导青年去探讨孔老墨的学说,好来解救日渐没落的欧洲,这令梁启超极为震惊。由此梁突发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去解决东方的经济落后,以东

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精神饥荒,“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时事新报》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二而一,创造第三种文明。梁启超形象地称之为中西文化“结婚”。当梁启超1920年返回中国后,即全力以赴去创建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新文明。具体办法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合,“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为全人类做贡献。梁启超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心态,开始了晚年的学术研究。《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也是在这样的特定心路当中写成的。

《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冬,仅半月成书。梁的好友蒋方震(百里),是和蔡锷齐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军事家,考察欧洲归来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恭请梁作序。梁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潮在许多地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写序时大加发挥,广泛评述,无法止笔,一下子多至5万余言,已不成序,遂单独成书,名《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反过来又为梁书作序。蒋在序言中,一方面肯定了梁此书的功力深厚,论辩超群,具有启蒙意义;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识不浓,致用学风不够,“人欲”自由没有发挥的空间以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国确立等问题,梁书都没有透彻地解释。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是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可补充的东西不少,但它精炼而高度概括,简明而线条明快,人们一眼就可以触摸到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和基本特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思想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梁以后钻研清代学术的学者,基本是按照此书的框架和思路作进一步研究的。

如果说《清代学术概论》是有关清代学术发展的一部纲要,那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十分翔实的专著了。后者近三十万言,从明代的最后20年讲起,直到1920年为止,恰好三百年,梁启超之所以不将书冠以“清代学术史”之名,原因有二:一、“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恰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

史”；二、“今年是公历 1923 年，上溯三百年前之 1623 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算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 17、18、19 三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75，第 1 页）。总之，为求清代学术发展的完整性，梁启超适当前后延伸，运用崭新的文化理念，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阐述三百年间的学术起伏、流变，不但较《清代学术概论》丰满多了，而且产生了一些新观点。

《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样，也是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22 年春，梁启超应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之请，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只有 4 讲，但集中了他的主要观点，很有见地。同年秋冬，他又在东南大学讲课，将原有的 4 讲扩编，在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先秦政治思想的内容。梁对先秦政治思想的总体描述是：四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潮流（无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四个共同特点。梁把所谓的四个共同特点概括为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具体是：一、中国人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把这些自然法则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最理想、最圆满的政治思想，“顺天行事”就是这个意思。二、君权神授，君权无限，认定皇帝有绝对的权威，还加上许多神秘的色彩。三、将美好的社会和国家理想化了，什么“大同”、“天下为公”等，全是空泛的纸上的东西，具体如何变为现实，从来不去研究，结果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四、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高，国家变成了具体的某朝某代，所谓“治国”、“平天下”，自然衍化成了为当权者效劳的代名词，国家究竟为何物全然不知。在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下，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怪圈，去建设现代国家。梁启超的分析，真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还应提及的是，梁启超之所以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目的是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和政治心理。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国民政治心理的写照，没有好的国民政治心理，好的政治不会从天而降。而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政治心理形成的基础，只有把那时的政治思想实质搞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中华民族政治素质的良方。《儒家哲学》写于 1927 年。此书较《先秦政治思想史》更富有哲理。梁启超虽然不是著名的哲学家，但实践能力极强，哲学意识很浓，非常善于吸收中外哲学

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运用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当中,他对儒家哲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都有相当的深度和独到的见解,对今天仍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佛学,梁启超是情有独钟。但和一般平民百姓的信佛不同,他既非盲从,也不是用迷信来麻醉和自我超脱,逃避现实,而是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形成自己的观点,以佛学理论来改造自己的人生观,解决心灵深处的苦闷。在他的头脑里,“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以求得自由解放和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4,第9页)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梁启超不仅大力宣传佛学的博大精深,而且刻苦研究佛学,成果斐然。这里选编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就是梁启超佛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包括佛学理论、佛学翻译和佛学史三个方面。梁启超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将佛学概括为一种心理学,实在是一种独创。在佛经翻译的研究上,他从中印文化交流的独特视角,论述了东汉至隋唐七百年间佛经东传的历史,涉及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是一部内容翔实、见解独到的佛经翻译史。他将整个七百年间的翻译过程划分为东汉至西晋、两晋至南北朝、唐贞观至贞元年间三个阶段的说法,一直为学术界所接受。关于佛教史,梁启超写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传世之作,简明扼要又颇有哲理地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植根、发展、兴盛和衰退的过程,对一些重要流派、著名高僧、社会影响、思想和文化冲击,包括僧尼、寺院、信徒等都有详尽的分析。研究中国佛学,不可不读梁启超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论著。

梁启超还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从发动戊戌变法到晚年的执教清华、南开,作过无数次的精彩演讲,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改革、文化重建、时局发展、历史透视、生活指南、人生走向、诗歌欣赏、书法艺术、学术研究、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方方面面。特别是梁启超晚年的演讲,是人生经验和学术研究的集中阐发,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在南

开中学演讲时,年轻的周恩来为他高深的见解和风趣幽默的表达所折服,认真记下了每一句话。从此,梁启超成了周恩来崇拜的英雄。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文化,在天津南开大学讲历史研究法,在上海谈振兴东方文化,在北京清华大学讲美学,在东京讲政治,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讲中国文化,都拥有众多的听众,收效甚广。可以讲,梁启超的演讲既是其思想、思维方法、文化追求的重要体现,又为中国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次出版的《梁启超演讲集》,选录了梁启超的一些重要演讲,编为一册,为我们从演讲这个崭新的角度了解梁启超,汲取任公先生留下的丰厚的文化营养提供了方便,不可不读。

李 喜 所

2005年3月31日于南开大学书来堂

编辑说明

梁启超是闻名中外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术大师，其著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从梁启超一千多万字的著作中，精选体现其文化观和学术思想的珍品，作为“饮冰室文萃丛书”，分册出版。

本丛书编校原则如下：

一、原著出版于二十世纪初期，内容、结构及语言文字自有其时代印痕。此次编辑出版，原则上一仍其旧，一般不做改动，以存原貌。

二、由专家选择权威版本。

三、将竖排繁体字本改为横排简体字本，采用现行分段形式及新式标点。

四、文字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但简化后易引起歧义的字词、具有时代特色及作者语言习惯的字词则不做改动。

五、数字一般遵照原著的用法。

六、独立成段的引文变换字体缩格排印，原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变字体加括号以区别于正文。

七、原著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将正字加括号排于其后，原著中漏排的文字在方括号中加以补正，正文均一律不予改动。

目 录

-
- 1 保国会演说词(1898.4)
4 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1912.10)
13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1913.4)
23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920.3)
26 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
(1921.10)
30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
观(1921.10)
41 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1921.11)
48 护国之役回顾谈(1922.12)
- 59 莅教育部演词(1917.3)
66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1917.3)
✓69 教育与政治(1922.7)
83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1922)
✓89 为学与做人(1922.12)
- 95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
126 历史统计学(1922.11)
135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1926)
- 148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1912.10)
153 对报界之演说(1917.3)

- 155 敬业与乐业(1922.8)
159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1925.6)
- 166 市民与银行(1921.11)
172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
主义(1921.12)
181 美术与科学(1922.4)
186 学问之趣味(1922.8)
✓190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1922.8)
✓193 人权与女权(1922.11)
199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1)
- 208 评非宗教同盟(1922.4)
215 佛教心理学浅测(1922.6)
- 232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1922.3)
248 情圣杜甫(1922.5)
261 屈原研究(1922.11)

保国会演说词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说

今日之会，惟诸君子过听，或以演说之事相督责。启超学识陋浅，言语朴讷，且久病初起，体气未复，无以应明命，又不敢阙焉以破会中之例，谨略述开会宗旨，以笔代舌，惟垂览焉。

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蠢然忧，眊然思，谓安得吾国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乃及今岁，胶、旅、大、威相继割弃，受胁失权之事，一月二十见。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千臆一念，千喙一声，举国戢戢，坐待割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而其议论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今有病者于此，家人亲戚，咸谓其病不可治也，相与委而去之，始焉虽无甚病，不浹旬必死矣。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

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也。且靡论病之必可治也，即治之罔效，及其死也，犹有衣衾棺槨之事焉，犹有托孤寄命之事焉，欲委而去之，盖有所不能矣。一人之身且有然，而况国之存亡，其所关系所牵率，有百倍于此者乎。故即瓜分之事已见，为奴之局已成，后此者犹当有事焉矣。执豕于牢，尚狂蹶而怒嗥，今数万里之沃壤，固犹未割也，数万万之贵种，固犹未縶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谓，是自求祸也。

《论语》之记孔子也，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夫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何谓分内所得行之事？今语人以变法，以办事，其在上者，必曰下无人才，无所可用也；其在下者，必曰上不变法，无一可言也。以故，疆臣则归罪政府，政府亦归罪疆臣；州县则归罪督抚，督抚亦归罪州县；士民则归罪有司，有司亦归罪士民。要而论之，相率以不发一论，不办一事而已。其太息痛恨涕哭唾骂之言，正以便其推诿卸责一齐放倒之计，而实非有一毫真心，以忧国忧天下者也。如真忧之，则必无以办事望人焉，以望诸己而已；必无以办事责人焉，以责诸己而已。各有不可诿之责分，各有可得为之权限。愿我士我大夫，皆移其责望人之心，以自望自责，则天下事之可为者，未有量也。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曰：“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盖天下无论何种人，皆可教皆可用，惟此死心塌地，一齐放倒，知其不可而不为者，虽圣贤末由而化之。且此辈者，岂惟自行放倒而已，其见有他人之实心忧天下者，则相与目笑之，鼻訾之，或掀拾言语举动之

小小过节，微词以诋排之，阻挠之，以佐其饱食群居、好行小慧之谈资以为快。嗟乎，痛哉！吾壹不知我中国人若此辈者何其多也。孔子一则曰“难”，再则曰“难”，再则曰“末如之何”。诚哉其难，诚哉其“末如之何”矣！

昔有英人某，游高丽归而著书，曰：“高丽其亡矣！入其国，见其人，终日无所事，但携筭一榼，三五为群，以清谈于阴树之下，永日永夜，人人如是，日日如是，国其能国乎！”呜呼！启超观于我京师之士大夫，而窃有感于斯言也。籍于朝者以千计，自一二要津显宦，疲精力于苞苴钻竞，日不暇给外，自余则皆饱食以待升转，终日无所事，既不读书，又不办事，堂堂岁月，无法消遣，乃相率自沈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征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若今之公车，自闱后榜前二十日间，集辇毂下者八千人，其无可消遣之情态，视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则皆能为忧瓜分惧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说，则曰：“今日事无可为，正我辈醇酒妇人之时也。”呜呼！行有死人，尚或殓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我士我大夫，岂必其有乐于此，无亦以保国之大事，非一手之为烈，救亡之条理，非举念之可得；或思救之而不得其下手之法，或独为之而苦无相助之人，日消月磨，而因自放云尔。夫同一法也，合群策以讨论之，斯易定矣；同一学也，合群智以讲求之，斯易成矣；同一事也，合群力以分任之，斯易治矣。然则，我士我大夫之所以自放于无用之地，以求为消遣岁月之谋，甘为游民，甘蹈高丽之覆辙而不悟者，殆皆以无学会之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楔而不舍，金石镂之。群之习之，摩之厉之，荡之决之，策之鞭之。意者佛兰金仙，其犹有将醒之时，而曾惠敏、乌西里之言，不终不验耶！则启超馨香而祝之，跪膜而礼之。

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

十月二十二日，民主党开全体大会欢迎先生于湖广会馆。在京党员咸集，各党来宾亦至。会场充满，无复隙地。首由方贞君述欢迎辞，称述先生道德学问，及前此所以尽瘁于国家者，并言先生与本党关系素密，今方当筹备成立伊始，一切待先生指导云云。次先生演说，凡历三小时，闻者莫不动容。演毕后由马相伯先生良继演，益发挥先生所演之精神。次则国民党来宾江天铎君亦有演说。其党员及来宾欲演者尚众，以为时已晏而止。先生演说如下。

鄙人归国后，赴民主党盛会三度于兹矣。初至天津之夕受本部干事诸贤张宴慰劳，翌二日，承直隶支部全体相邀茶话。鄙人皆尝于席间，略摭所怀奉尘清听。今复承开全体大会于首善之区，群贤咸集，猥相奖借，荣幸何如。

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此不待烦言者也。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其先各党林立，派别繁多，至今日已渐合并成为数大政党。若共和党国民党皆是也。民主党成立虽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则不让他党，此亦天下所共见，不劳鄙人再为颂祷者也。